

经济为什么增长

Why Economies Grow

[美] 杰夫·马德里克 著



快速增长本身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源泉，
但问题是，
这种增长能持续多久？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经济为什么增长

Why Economies Grow

【美】杰夫·马德里克 著
乔江涛 译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为什么增长 / [美] 马德里克著; 乔江涛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7

书名原文: Why Economies Grow

ISBN 7-80073-800-0

I. 经… II. ①马… ②乔… III. 经济增长-研究-美国 IV. F1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49803号

Why Economies Grow

Copyright © 2002 by Jeffrey Madrick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经济为什么增长

JINGJI WEISHENME ZENGZHANG

著 者: [美] 杰夫·马德里克

译 者: 乔江涛

责任编辑: 蒋 蕾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3-1735

书 号: ISBN 7-80073-800-0/F · 53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科拉和米尔顿·马德里克

20世纪90年代似乎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至少从美国大众文化来看，无处不在的成功案例已经使民众中滋生出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高科技股市以及广阔市场的空前繁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增长，特别是在那些与计算机技术及通讯技术相关的领域中，更是如此。巨大的财富引来媒体一片赞誉之声。更重要的是，90年代后期生产率突飞猛进的提高似乎已经实现了人们长久企盼的那个梦想，自商用和家用电脑被广泛采用之后，人们便开始憧憬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在一片极端狂热中，也有一些分析家和学者主张用更谨慎的态度看待这些新技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他们强调，尽管计算机革命无疑是重要的，但就此判断它将会长期带动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还为时尚早。毕竟，在“计算机股票”的价值如此猛烈窜升的情况下，它为人们带来大量的财富并不奇怪。最终，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不可避免的市场“纠正”之后，人们不得不开始以更加审慎的眼光来评价通讯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对所谓的新经济有了更加现实的认识，或许我们在认识经济现实上所犯的这一最大的错误应该归咎于我们对经济史知识的普遍匮乏，这种知识匮乏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视纯理论分析和模型的建立。尽管这样的工作常常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削弱了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真实世界的认识。经济史学家们总的来说还没有弥补这一缺憾，特别是那些重点研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史学家。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将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与对经济史的深刻理解结合起来，更少有人能够将这种认识转化为一针见血却又通俗易懂的著作。幸运的是，本书作者杰夫·马德里克做到了这一点。

本书并不是马德里克的第一本著作，作为《挑战》杂志（*Challenge*）的编辑，《富裕的终结：美国经济困境的起因及后果》（*The End of Affluenc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Economic Dilemma*）一书的作者，以及《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贡献卓著的专栏作家，他曾经与我们世纪基金会（The Century Foundation）有过合作，曾经担任本会过去10年经济发展论文集《超凡智慧：新经济的可能前景》（*Unconventional Wisdom: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Economy*）的主编。

本书的过人之处来自于马德里克独特的洞察力，他敏锐地认识到了社会、法律、技术进步、文化发展以及他所说的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影响。与某些经济学家机械的数学模型不同的是（那些经济学家按照资本贡献率和技术贡献率来划分经济增长），马德里克的分析融入了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所发生的复杂变化。

正像他所提到的一样，自然资源与经济的加速增长无关，或者说几乎无关。自然资源，自人类存在就已经有了，而仅当人类以知识和想像力创造出新的方法来提取和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才开始具有经济上的意义。的确，交易的扩大、移民以及市场的增长（也就是马德里克在中心论点中所表明的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动力），最终都要依靠新的运输、通讯以及战争方式的出现，而它们正是知识积累的成果。马德里克始终提醒我们注意，我们之所以正享受着以历史标准来看不可思议的富足和长寿，正是因为政治和商业制度逐步而有机的演进，这种文化上的发展使贸易、城市化和发明创造成为可能。

马德里克还尖锐地提出了大多数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最新一代的美国人经历了一个财富迅猛增长、收入分配却不公平的年代，这一始料未及的现象也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问题。尽管有些分析家将收入差距问题归咎于没有将一些年轻人一生中收入层次的

提高考虑在内，因此导致了统计误差，但更加严谨的研究证实这一点已经考虑在内。最新达成的共识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加剧了。尽管许多人寄希望于生产率的提高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能够缓和这种不公，但效果究竟如何却缺乏有力的证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当今的经济状况呢？马德里克令人信服地说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所谓新经济不过是夸大其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和规则并没有改变。这些年中那些新发明、越来越低的通讯成本以及迅速丰富而完善的知识体系，同内燃机和电力发动机的发明一样，对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并没有什么影响。仅仅关注这些主要的技术革新而忽视市场的适应性、扩展性和金融改革，就等于将经济增长进程过分简单化，等于否定了经济增长的内在连续性。马德里克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从历史性和制度性的角度审视了当今的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跳出令人窒息的新经济迷信，我们仍然有理由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长期活力充满信心。

自从本会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我们的主要研究领域。过去的10年中，在我们的支持下，许多学者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著作就是研究成果之一。其他成果还包括：由马德里克担任主编的《超凡智慧》，前面已经提到；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的《一切为了销售》（*Everything for Sale*）；杰米·加尔布雷思（Jamie Galbraith）的《人为的不平等》（*Created Unequal*）；巴里·布卢斯通（Barry Bluestone）和贝内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的《成长中的繁荣》（*Growing Prosperity*）；保罗·奥斯特曼（Paul Osterman）的《确保繁荣》（*Securing Prosperity*）；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和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的《神奇的十年》（*The Fabulous Decade*）；以及由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协助出版的论文集《繁

荣的90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除此之外，我们同样着眼于经济政策的探讨，即将进行的研究包括：西蒙·黑德 (Simon Head) 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影响的考察；乔纳斯·庞图森 (Jonas Pontusson) 关于其他国家劳动力、收入分配和公共政策对美国之借鉴意义的研究；爱德华·沃尔夫 (Edward Wolff) 对技术、劳动和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分析。

现在还远远不是给新经济下结论的时候，对于新经济，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严谨的理论分析都还处在初级阶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德里克的著作将在今后的许多年中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和未来前景提供关键性的指导。我们也企盼着马德里克将会继续在这一事关公共政策和美国人民生活的重要领域做出贡献。

理查德·莱昂内

世纪基金会总裁

2002年5月

致谢

当一本书要对传统思想提出挑战时，支持它的人也需要勇气。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种新经济正在将这个国家带向前所未有的无尽繁荣之时，我开始构思这本书。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繁荣之源这一问题，许多人几乎众口一词认为答案是新技术，当然，他们还不忘强调对自由市场的回归。

本书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我必须首先感谢世纪基金会的总裁理查德·莱昂内，对于这一可能会不受欢迎的作品，他给予了始终如一的支持。其次我要感谢他的助理格雷格·安里格（Greg Anrig），同样感谢他毫无保留的支持。作为世纪基金会的出版主任，贝弗利·戈德堡（Beverly Goldberg）对本书的出版功不可没。世纪基金会的经济学家伯纳德·瓦索（Bernard Wasow），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尽管我们之间也有观点上的分歧。另外我还要对贾森·兰克尔（Jason Ranker）和萨拉·纳尔逊（Sarah Nelson）致以真诚的谢意。

还有其他许多支持我的人需要感谢。基础读物出版社的发行人约翰·多纳蒂克（John Donatich）和威廉·弗拉克特（William Frucht），是本书狂热而忠实的拥护者，是他们的热情使我能够更好地写作该书，对此我感激不尽。作为本书尽职尽责的编辑，比尔·弗拉克特（Bill Frucht）充满了热情。我还想感谢费利西蒂·塔克（Felicity Tucker）和她的全体编辑人员，以及封面设计布拉德福德·福尔茨（Bradford Foltz），感谢他们的卓越工作。

最后，正像我在以前的一本书中曾经表示过的那样，我要感谢所有的经济史学家。在本书中我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了批评，但并不能掩盖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在这一学术领域中他们是非常值得尊重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时尚更多地只是影响而不是接受经济史学，正是对这样一门学科，他们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的家人以及几位老朋友是我最好的顾问。我最感谢他们。

目 录

序 致谢

1	经济增长之源	1
2	新经济的谎言	17
3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39
4	工业革命的原因	57
5	美国工业革命的奇迹	83
6	20世纪后期的缓慢增长	105
7	繁荣重现的原因	137
8	对繁荣的挑战	159
9	让美国增长：挑战和原理	171
10	让美国增长：我的规划	195
11	未来的绊脚石	219

1

经济增长之源

在不久前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经济学家用幻灯机展示了一幅图表，这一图表在探讨经济繁荣与增长之源时经常被用到。表中的曲线在中世纪时代缓慢上升，反映了公元1000~1800年8个世纪之间微不足道的经济增长率。但到1800年左右，曲线以大约45°角陡然上升，一直延伸到当代。自工业革命开始后，收入也开始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速度持续增长。

于是这位经济学家提出了那个传统的问题：为什么1800年之前的技术进步不足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呢？他认为，正像大多数历史观察家——包括一些资深经济学家所认同的一样，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之源，是工业革命发生的核心的甚至是惟一的动因。他所说的“技术进步”显然是指那些伟大的发明，从手摇纺车、水磨机到蒸汽机、发电机的伟大发明。换句话说，他认为在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缓慢的经济增长只是因为缺乏足够多的伟大发明的推动，直到1800年左右那个或多或少有些神奇的历史转折点，一切才发生了变化。

类似的，如果被问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何如此之快，多数现代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几乎肯定会将其归因于新技术的推动。当然，他们特别强调的是与半导体和计算机相关的信息技术——又是伟大的发明。

本书认为这样的增长观是错误的。运用历史、民间、经验主义的证据和经济学理论，本书检验了关于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广泛问题的传统思想。中心论点是，发明创造及其相关因素并非经济繁荣的惟一源头，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源头。经济增长需要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还是它的结果，或许更主要的是结果。另外，技术进步不仅仅是指那些伟大的发明，还包括成千上万的相关创新。伟大发明的产生过程远比人们想像的要漫长艰辛，每一项发明都包含了许许多多前人的

贡献。

本书认为，由贸易发展、殖民地化、国内市场膨胀所导致的市场成长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因¹。这里的“市场”指的是从事商品与服务交易的人群。这些市场随着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也在增长。市场的增长与信息的快速流动和传播紧密相关，而信息的流动传播是市场膨胀和移民浪潮的典型副产品。市场与信息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当今世界最普遍采用的那些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包括增加储蓄、减少政府干预以及其他一些自由经济政策，甚至对研发工作增加政府津贴等，并不足以发挥作用。而市场与信息，尽管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因，也不能独立发挥作用。事实上，经济增长的产生与促进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也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举一个当代的例子，许多国家在二战之后的数十年中打入了美国市场，但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只有东亚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市场。除市场规模和市场成长、信息传播、技术进步之外，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还包括：人口的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财富或者说盈利性资产的分配；金融资本的可获得性；金融和法律制度的发展；自然资源丰裕度；企业家精神的活力；和平状况和政局稳定性。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没有哪一个能够独当一面。所有这些因素，既是经济增长之因，也是经济增长之果。

尽管如此，在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本书指公元1000年之后），这些因素中的一些要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其中一些因素相比其他因素更加接近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动力，更加接近真正的繁荣之源。

如果我们将这些因素按照其重要性从左至右排列，将那些作为经济增长之因重于经济增长之果的因素放置在左端，那么市场规模和信息传播将会出现在最左端，最接近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动

力或者真正的繁荣之源。另外，这两者之间首当其冲的是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规模和扩张。至少从中世纪开始，进行大宗货物贸易的可能性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²。国内市场，包括国内贸易以及跨境贸易，提供了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可能性，创造出对服务业特别是那些与货物交易相关的通讯、运输、批发和零售服务的强大需求，并且激发了新产品和新技术创造的积极性。交流与贸易不断带动丰富的创意和信息的出现。

市场的存在本质上意味着私人财产合理化或者受到保护，即使只能通过所有者或者交易者本身的力量来维持这一点。但是法律制度，或者半法律制度，包括司法系统，更大程度上只是市场和贸易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³。早期的市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垄断盛行，贸易路线受到严格的控制。即使最初级的竞争也需要政府或团体管制来实现，这种管制对于交易者权益保护也是必不可少的。现代人观念中的自由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后天发展的结果，而非与生俱来的。

在我们的排列中排在左端第二的是信息的可获得性。更确切地说，是信息的获得成本、获得渠道以及为多数人所消化吸收的可能性。市场和贸易长久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它们与信息总是相辅相成的。市场成长了，信息便得以传播。早期蔓延欧洲大陆的频繁的劳工移民，便是种植技术和生产技术传播的主要原因。随后，文化和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信息的价值，因为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利用并传播这些信息。

关于贸易与信息的携手并进，城镇的发展是一个经典案例。在中世纪，交易集市曾经是经济的中心环节，但它最终被城镇所取代。由于商品、服务和信息能够以低成本进行交易，无论是集市还是城镇都是本质上更具效率的市场，那时候，交易、运输和通讯成本降到了最低点。城镇化成为英国和欧洲经济增长必不可

少的推动力⁴。总而言之，信息与市场密不可分，相比起其他因素，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市场的规模发展更加接近经济繁荣的第一原动力。

关于市场的重要性，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还将有所扩展。现在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交易本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⁵。通过交易，一个人可以卖掉自己最棒的产品而买来其他人最具优势的产品；一个农业区可以卖掉这片土地上最好的作物而买来另外一个农业区最好的作物。而后者进行交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基于地理条件的专门技能或技术，从而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换回他们不具优势的其他产品。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给我我想要的，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都得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并获得了经济的增长。”⁶随着经济的逐渐成熟，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也越来越大。

有人可能认为，自然资源如煤炭、铁矿石、石油以及茂盛的森林等，是经济繁荣当然的首要源泉，应该被放置在我们排列序表的最左端。对这一简单的论断，我不敢苟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阿拉伯半岛丰富的石油储量被发现、开采并付诸商业用途之前的几个世纪，阿拉伯国家虽然脚踩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并没有获得这种想当然的经济繁荣。而另一个极端，日本却在缺乏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在他们的土地上寻找更多的资源，部分原因是经济动机的刺激以及更好的勘探设备和充裕的资金。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初始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也在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开发新的资源储备。显然，资源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还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剩余资本（储蓄）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储蓄将会转化为投资，继而带动经济增长⁷。这种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占有统治地位。然而在早期的经济社会中，人们



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之后，只有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储蓄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储蓄。因此，只有当经济已经步入增长，收入已经足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并且出现许多良好的机会（动机）使得储蓄变为一种理想的投资手段时，储蓄的增长才会变得普遍可能。只有当这一切发生时，资本才会得到积累或者从其他国家流入。因此，储蓄看起来不太应该在我们的排序中过于靠左。

这种将储蓄作为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最令人迷惑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有足够多的储蓄甚至过剩的储蓄（有人认为这样最好）可以利用，它们自然会被有效投资。这一假设包含在许多早期经济思想中，包括亚当·斯密的思想。当然，从经济运行后果来看，投资和储蓄是相等的，但就此得出储蓄增长必然导致投资增长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历史充分证明这个结论并不成立。储蓄对于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并非首要动力。投资，更大程度上是受到市场成长和新产品出现所创造的投资机会的推动，而非储蓄的增加。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中，包括美国，储蓄的不足都通过国际借贷得到了弥补。

与储蓄中心论类似的是，有些人认为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应该出现在我们排序的左端。但是，只是在经济发展得足够成熟，从而要求在储蓄与经济之间搭建桥梁的时候，金融机构才得以出现，它们本身并没有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金融机构规模的扩张以及影响的增大得益于对这些机构的需求的增加——当储蓄规模不断增大并且可以集中起来进行卓有成效的投资时，就产生了对金融机构的需求。通过将积累起来的储蓄付诸投资，那些大型的、具有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的金融机构，可以对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巨额资本的分散化投资能够充分地降低投资风险，但是金融机构是典型的经济增长之果，而不

是动因，在我们的排序中靠右一点更加恰当⁸。

最近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观点，将那些基本经济权利（比如对私人财产及合法契约的保障）作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这些权利，对于西方经济发展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同样，它们远远谈不上最重要的增长之源。它们的发展，甚至它们最早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只是经济动机产生和成长的后果。是市场交易动机促进了经济权利和市场保障法律的发展，而且在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保障出现之前，虽不成熟但具有足够效率的市场已经存在了。那时候财产所有权显然已经被承认，只不过保护财产靠的是力量，而不是权利。而相对自由的市场，正如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一样，是政府的社会构建⁹。另外，许多国家尽管在经济权利制度上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但一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许多观察家，特别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伟大源泉¹⁰。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一般来说，企业家精神相比技术贡献更加接近真正的繁荣之源，企业家们能够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营销方式和新的管理体系。但在我们的排序中，这一因素同样不会太接近左端。它需要一定的环境，而不仅仅是独立存在的人类属性。换句话说，它需要相当成熟的经济激励体系——也就是优胜劣汰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经济体系必须对风险投资和创新活动给予足够的回报。事实上，对企业家精神影响最大的恰恰是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本身。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种强调管理能力和管理创新重要性的观点，也就是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所大力支持的观点¹¹。美国的先进管理及相关优势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它只是经济发展的后果，而不是经济增长首要源头。